

戰爭記憶 & 轉型正義

——二次大戰終戰70週年，德國紀念活動參訪紀要

文·圖／花亦芬



1990年春，筆者在德國，與土耳其同學。

筆者自臺大歷史系畢業後，至德國科隆大學自大一重新讀起，直至取得博士學位。10年光陰（1989-1999）荏苒，但也剛好遇上東歐政治、社會情勢丕變，柏林圍牆倒塌，兩德民主統一，遷都柏林……等重大事件發生的歷史時刻。歷史時空的因緣巧合，幸運能在自己對新事物充滿吸收能力的年輕歲月，近距離體察20世紀末世界史重大發展的歷程。

今年3月底，接獲德國外交部邀請，於5月4日至8日在柏林與德勒斯登（Dresden）參加德國紀念二次世界大戰終戰70週年參訪活動。參訪的主題是“Dialogue with Germany:

How Germany is dealing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0 year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參訪團的成員來自17個國家，筆者以臺灣代表的身分參與此次活動。

這個邀訪是個意外的驚喜，也是一趟意義豐饒的旅程。

歷史不應只是認識過去，更應為當下的公義與未來努力

20世紀前期的德國史，充滿黑暗、悲劇、創傷。20世紀末期的德國史，卻積極往人類史上從未經驗過的區域和平建構大道奮力邁進。

就歷史學而言，70年的時間長度，並不算長；但對德國人而言，這70年卻充滿了張力破表的起伏跌宕：希特勒與法西斯政權對猶太人的迫害屠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冷戰與東西德分裂，六零年代學生運動與西德轉型正義工作開展，柏林圍牆倒塌與兩德民主統一，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解體，以及歐盟成立。

從滿目瘡痍、噤聲無語的戰敗國，到積極從事轉型正義、不斷為過往歷史過錯道歉的經濟大國；從幾乎沒有外交自主權的被制約國家，到今日歐盟的龍頭。德國在過去70年走過的曲折路程，不僅是人類史上罕見；對德國人而言，更是他們痛定思痛後，以極大的貫徹力在教育與文化內容上做出重大革新，才辛苦獲致的成果。

如果用一個關鍵概念來說明德國人如何做到這一切？那就是他們推動了德文所說的

“Erinnerungskultur”（culture of memory）。

對德國而言，歷史記憶，不是一味地懷思古之幽情，想藉由述說前人留下的光榮遺產，建構己身在時空座標裡足以安身立命的自信與驕傲。面對二戰之前滿目瘡痍的歷史，德國人清楚地意識到，所謂「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包含了釐清過去不斷積累下來的歷史迷障，看清過去錯誤所行之路留給後世的沈重包袱，而願意勇敢真實地面對歷史真相，將慘痛的歷史教訓攤開在陽光下供全世界公開討論，在此基礎上確實思考，更符合公義的現在與未來應如何打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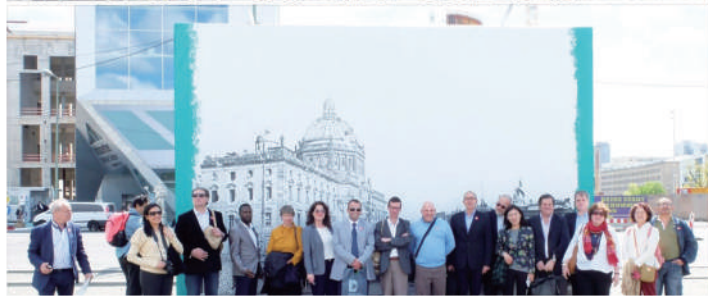
第一天（5月4日）的參訪行程，便是與德國國會議員Hiltrud Lotze（SPD）會談“Politics of Memory in Germany”。這不僅牽涉到戰後德國的教育、文化政策，也跟外交政策息息相關。換言之，徹底清除納粹陰影，不僅是現代德國立國的最基本原則；不斷透過認錯、道歉與和解，來修補德國與以色列，及與鄰近的波蘭、捷克……等國的關係，打造區域和平的保證，更是德國外交政策的主軸。

第二天上午，參觀離柏林不遠的Sachsenhausen納粹集中營（Sachsenhausen Memorial and Museum），並聽取簡報。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恐怖，不僅在於人數之多，而且還強調是用當時的高科技來進行有效率的系統性滅絕。Sachsenhausen集中營就是很典型的代表。

目前的Sachsenhausen集中營是在 1998年重新整理後開放的。之前，在東德時期，這裡也自1961年起，被東德政府作為共產黨擊敗希特勒法西斯政權的歷史紀念地標。兩個不同政體的政府處理納粹過往，有不少值得深入檢視的差異，留待日後寫成書時再詳談。筆者在這裡也看到了納粹時期反希特勒的基督新教「告白教會」

ifa Institut für Auslandsbeziehungen (ifa) 新加坡 2 張新相片 · 5月6日 17:15 ·

On 8 May 1945 - 70 years ago - World War Two ended. Historians, experts for education and memory culture and specialised journalists are currently touring Berlin to learn how Germany deals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They have been invited by the Federal Foreign Office.



德國Institute for Foreign Cultural Relations（ifa）臉書官網公布參訪團的活動訊息。筆者身著白襯衫（上圖左7、下圖右2）。

（die Bekennende Kirche）猶太裔法律顧問Friedrich Weessler（1891-1937）受迫害過程中種種相關法律文件。

保留歷史現場與相關歷史文件，不刻意提出片面、武斷的詮釋，而讓參觀者透過與過去不公不義的歷史直接面對面，並鼓勵各種團體（例如德國與波蘭的中小學生，受難者與年輕世代）在歷史現場互相對話，以此讓個人的感知與歷史悲劇在現場產生直接連結，並激發參觀者在自己內心進行反思，而非停留在官方宣導



柏林市中心5月的街景：到處都是有關二戰歷史文化的戶外展覽，希望大家再一次記住歷史教訓。



在柏林與歐洲不少地方的住宅門前馬路上都可見到紀念猶太人受難的紀念石（Stolperstein）。這一塊是鋪在Friedrich Weessler在柏林原來住處門前（Meiningenallee 7, Berlin-Westend），提醒過路人這裡曾經發生過的歷史悲劇。引自：[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tolperstein_Meiningenallee_7_\(Westend\)_Friedrich_Wei%C3%9Fler.jpg](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tolperstein_Meiningenallee_7_(Westend)_Friedrich_Wei%C3%9Fler.jpg)

的聽聞層次，這是德國保留集中營原貌，來進行轉型正義歷史教育的基本原則。用館方的說法，這是「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d）的做法。意即讓每位參觀者建構屬於自己的歷史記憶，並讓這樣的歷史記憶成為民主多元社會的一部分。

談戰爭史不是論勝負，如何消泯戰爭才是真正重要的議題

從臺北動身前往德國前，臺灣的社群媒體上，已有不少關於「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活動的討論。臺灣究竟該紀念「戰勝」？還是該以當時臺灣做為日本殖民地，因而是屬於「戰敗」那一方來看待？

「戰勝」？「戰敗」？說穿了，是掌權者的語言，他們往往想從戰勝或戰敗的論述裡，擷取對鞏固自己政治利益有加分作用的話語。對廣大的無辜平民而言，「戰爭」向來就是殘酷而不人道，只會帶來離散與傷亡。人類應該致力的，不是討論自己究竟屬於戰勝或戰敗方，更不是去道德化從事戰爭的行徑；而應積極去思考，如何免於戰爭，讓國民的生命安全與人性尊嚴得到維護？

這個反省的面向，不僅是德國歷史教育對20世紀史重要的詮釋觀點，也是這次參訪行程安排的主軸之一。

5月6日的行程，主要就是在德勒斯登（Dresden）與聯邦德國軍事史博物館（Bundeswehr Military History Museum）館長Prof. Dr. Matthias Rogg會談。

Matthias Rogg館長原本是在德國坦克部隊服役的上校。他於1989-1998年間，到Freiburg大學讀歷史與藝術史。取得博士學位後，他開始由軍隊實務轉向軍事史研究，並於2008年取得正教授資格。在此期間，他一手規劃2010年才開幕的聯邦德國軍事史博物館。

筆者過去未曾有過與德國高階軍官對談的經驗，這次與Rogg館長會談，大家都對他直率敏捷、深具人文關懷的應答留下深刻印象。Rogg館長在簡介中，一開始就指出，作為軍事史博物館的規劃者，他立下的原則就是：「不展示武器、軍服、與坦克」。

換言之，這座與戰爭息息相關的新博物館，不像其他國家的軍事、或戰爭博物館那樣，想藉由精心設計過的展示空間，來宣揚國威與軍威。相反地，這座博物館要從人文思考的角度出發，帶領觀眾反省戰爭的本質，從中探索人心深處的好鬥本性與難以按耐的侵略性，並思考邁向和平之道。在展示上，主要的重點是放在「人」—侵略者，共謀者，與犧牲者—身上；而非放在先進軍備的展示與爾虞我詐的戰略分析上。

面對當前世界局勢「新冷戰」之聲不斷響起之際，中國與俄國不斷想透過經濟與軍事行動，擴張自己獨霸世界的危機時刻，Rogg館長以軍人之姿，直指戰爭本質出於人逞強好鬥的本性，沒有值得誇耀或大做文章之處的思考，實在值得臺灣還想鼓吹「抗戰勝利」者、甚至想利用道德化論述再一次挑撥仇日情緒者好好省思。

以臺灣代表身分進入德國外交部

最後兩天的活動，主要聚焦於聯邦政府機構的正式參訪。5月7日上午參訪德國外交部外交檔案史料館（The Political Archive），由館長親自接待導覽。館長在簡介時，首先告訴我們，這棟建築在20世紀初期，原是「帝國銀行」（Reichsbank）所在地。1999年遷都柏林時，之所以選擇這棟建築作為外交部館址，主要是著眼於以前的「帝國銀行」為了儲存大量黃金，把地下室打造得猶如銅牆鐵壁，因此很適合放置珍貴的外交檔案。



聯邦德國軍事史博物館館長 Prof. Dr. Matthias Rogg解說他如何規劃以「人性關懷」為主，而不以「戰爭」為主的軍事史博物館。



德國外交部外交檔案史料館的檔案資料櫃。該館典藏資料，開放給全世界研究者使用。



筆者在德國外交部International Club 接受午宴招待。

在這個部分，的確值得順帶一提，德國人在保存史料文獻上所花的心力，向來細膩用心到令人稱奇。兩年前，筆者受哈佛大學文藝復興研究中心之邀，前往佛羅倫斯參觀德國設於該地的「藝術史研究院圖像檔案庫」（Photothek des Kunsthistorischen Instituts in Florenz），亦見到同樣精心典藏的檔案資料庫。但是這些精心保存史料的重地，卻又像德國所有圖書館那樣，是對所有人開放的。如何善用納稅人的錢來促進最大公共利益，提升國民智識素質，鼓勵國民養成深入探索知識真理的習慣，而不落於「知識經濟」的資本主義計算，德國的確是很好的典範。

5月7日中午在外交部接待重要貴賓的International Club接受午宴招待。由外交部負責對外文化政策與聯繫部門主管接待我們。

這一路的參訪，從參與者的資料到各種會談的場合，很高興我都是以來自“Taiwan”的教授身分被介紹。外交部午宴餐桌上，我的名牌上的國名也正式寫著“Taiwan”。

德國官方如何紀念二次大戰終戰70週年

5月8日上午，再度進入德國國會，參加德國官方紀念二次大戰終戰70週年的紀念典禮。參加典禮之前，我們每個人都收到德國國會議長與眾議院議長聯名發出的請帖。

這個紀念儀式由國會議長Norbert Lammert與眾議院議長Volker Bouffier主持。總統Joachim Gauck，總理Angela Merkel，憲法法庭主席Andreas Voßkuhle以及所有內閣成員與國會議員均出席參加。紀念演講是由德國著名的歷史學者Prof. Dr. Heinrich August Winkler主講。

兩年前我在歷史系開設的德國史課程，正是用Winkler教授寫的兩大巨冊名著英譯本*Germany: The Long Road West*（德文原書名：*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作為教材。如今在這個具有重大紀念意義的典禮上，看他以備受尊崇的史學家身分發表演講，也讓我深深想起兩年前的那門課，學生第一次在思想密度非常高的文句裡，學習了解德國重量級歷史家如何論述德國自近代以來，所走過的路如何被歷史迷思纏繞，步伐又是如何被誤導。當然，書的第二冊也包含二戰之後，德國如何辛苦掙脫傳統思想的枷鎖，如何下定決心邁向民主深化，走上轉型正義之路。臺灣學生很少被要求閱讀批判性、思考性那麼強，文句內容密度那麼高的歷史經典著作，剛開始時十分吃力。但是，後來他們也開始享受這種論述歷史的開闊視野，逐漸能夠了解：只有當一個國家擁有這種具有高度批判思考能力的歷史學者，這個國家的歷史教育才真的有能力為下一代帶來希望。

5月8日下午進行了此行最後一個參訪活動，拜會處理德國與猶太人歷史和解及負責被強迫勞役者受害賠償撫卹的基金會Foundation Remembrance, Responsibility, and Future（Stiftung 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Zukunft. 簡稱EVZ），並與該基金會主席Dr. Michael Jansen進行會談。Michael Jansen博士是德國資深高階外交官與前總統府秘書長。自公職退休後，特別被禮聘來接掌這個意義重大的基金會主席工作，負起德國官方與大企業跟猶太人和解的重責大任。

這個基金會成立於2000年，當初成立的主要宗旨是負責德國大企業在納粹時期強迫猶太人勞役（forced labor）的賠償與撫卹問題。基金會成立的本金共計52億歐元，由德國政府出資一半，另一半則由納粹時期曾利用強迫勞役賺取不當利潤的14家德國大企業負責。除了支付被強迫勞役的猶太

人的賠償金與撫慰金外，基金會留下3億5千8百萬歐元作為營運本金，致力於推動德國與猶太人和解與歷史記憶、歷史教育相關工作，以及推動各種有利於世界人權發展的計畫。

說起來，這個位於猶太博物館旁邊的基金會資本非常雄厚。但是，內部陳設之簡樸，連入口處門牌都平淡到不起眼的地步，讓人印象深刻。德國與猶太人歷史和解工作著重於不斷有實質作為，而非停留在表面上的官方辭令，確可由此管窺。

歷史教育應是「反省」的教育

結束德國參訪行程返國後，筆者於5月13日晚上，在本校社科院3樓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與德國在臺協會處長Dr. Martin Eberts以及本校外文系退休德文講師蕭亞麟老師，共同主持德國在臺協會紀念二戰終戰70週年電影欣賞（Sophie Scholl—the Last Days）映後座談。

回到臺灣，回到還需要為臺灣歷史教育繼續奮鬥的地方，一切就又平凡如日常；卻也每一日都值得用心付出。

回首這5天的參訪，行程十分緊湊。往往早上8點或最晚8點半就得從飯店出發，而返回飯店的時間總是在晚上9點、10點之後。然而，密集地參訪，密集地與德國政府機構主管或各種NGO執行長會談，我們不僅深入看到德國過去為轉型正義所付出的努力，了解他們目前還在面對、處理的問題，以及當前他們社會新產生的頭痛問題（例如Pegida）；我們也從同行者在參訪時熱烈的提問、與彼此間的交談，對目前國際局勢有貼近實況的認識。對於世界各國與德國歷來的外交情形，也讓我擁有絕佳的機會深入多元地去了解全球不同區域的狀況。

整體而言，德國從反省角度出發，在教育、文化、政治、外交各領域，以至於城市景觀所建構起來的“culture of memory”，對現代歐洲文明的影響，正持續擴大中。

2003年，梵蒂岡公開二戰期間教廷與納粹來往的機密檔案。2009年，法國最高行政法院（the



2015/05/13 與德國在臺協會Martin Eberts處長，本校外文系退休德文講師蕭亞麟老師共同主持紀念二戰終戰70週年座談。

Paris administrative court) 正式對法國政府在二戰期間把7萬6千名猶太人遣送到Auschwitz集中營做出道歉；2014年底，法國國家鐵路公司為曾經幫忙納粹載運猶太人到集中營，支付猶太人6千萬美金賠款。除此之外，2013年，瑞典也反省他們過往對吉普賽人的迫害，並立法明訂，這個歷史過失必須列入國民教育內容，教導下一代深切認知人權價值的重要，不可重蹈歷史覆轍。

歷史的認知，不是單純地「認識過去」。歷史教育也不應停留在「認識過去」的教育。畢竟「過去」究竟該如何認知，是可以操控的，尤其是政治掌權者可以操控的。如同英國著名的小說家George Orwell（1903-1950）在《1984》所說：「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

德國的歷史教育走上道歉的路，走上「深切反省」的路，而不是為過去政策錯誤繼續擦脂抹粉，這讓他們真正獲得重生。在寬闊的世界舞台上，踏實而有自信地逐步成為大家可以接納的歐盟領頭羊。這是過去只想用「鐵與血」、只想用國族主義思想教育來爭勝的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想都想不到的事。

從德國踏實走上轉型正義之路，所獲得的正面歷史經驗與實質效益來看，東亞各國政府與其互相怨懟仇視，不如從反省自己也做過不少錯事開始。這不僅可以在「新冷戰」一觸即發的此刻，為東亞和平帶來曙光。也可為東亞根深蒂固、但對年輕世代實無任何啟發新意的家父長威權文化，

帶來體質轉變的新契機。為東亞的長治久安，帶來大家真正可以在一起具體想像的新希望。☺



在德國國會參與德國官方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70週年紀念儀式。拍攝於典禮開始前。第一排由左向右：屬於德國外交部的Institute for Foreign Cultural Relations (ifa), Dr. Odila Triebel (Head of section Dialogue and Research “Cultural and Foreign Policy”), 筆者，匈牙利社會學教授Prof. G. Csepeli。

花亦芬小檔案

臺大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晚期至近現代宗教史、社會文化史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曾獲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獎以及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2012-2014年任《臺大歷史學報》主編。2014年與史學界朋友共同成立學術部落格及臉書專頁《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https://www.facebook.com/historyforumtw>），推廣「公民史學」，目前讀者群已超過兩萬人。譯有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本嘗試之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初版，2013年第二版）。著有《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圖錄》（臺北：輔仁大學，2006）、《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臺北：三民書局，2008），以及論文20餘篇。自2015年起，經營個人臉書部落格《花亦芬專欄》。針對本文所述德國參訪內容，即將出版《歷史現場的歷史記憶：柏林 & 德勒斯登》一書。此外另有一本關於宗教改革500年的寫書計畫在進行中。